2026年11月23日 星期一 责编:赵润琴 美编:曹磊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津派文化大家谈

津与卫 天下气象与家国情怀

——天津城市文化的人文地理学解读

刘志松

一座城市的名字,往往藏着它的品格。

中国的大城市多以山川形胜、帝王封号或方位沿革得名,而天津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复合基因:“津”是渡口,是流通,是通达天下;“卫”是军制,是拱卫,是守土有责。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设天津卫、筑天津城。此后六百余年间,这两个字被一道写入城池的砖石、河海的波涛、市井的烟火与家国的记忆,逐渐沉淀为天津城市文化的源代码。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学命题。当一座城市以“津”寄寓其通达之志,又以“卫”铭刻其守护之责,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向外敞开,向天下敞开;向内持守,为家国持守。这种“津卫”互构,正是天津区别于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人文地理学逻辑。

今天,天津已经发展为一座人口超千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天津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总书记提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重要要求,为天津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辨析“津”与“卫”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核,梳理其生成的历史逻辑,把握其外在表现的具体特质,并谋划其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对于塑造城市精神、擦亮津派文化品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津”
通达天下的枢纽功能与开放胸怀

“津”字的本义,是渡口。《说文解字》释“津”为“水渡也”。民用为渡,官用为津,天津得名之初,首先是“天子经由之渡口”。据明弘治年间朝臣程敏政所撰《天津重修涌泉寺记》记载,朱棣“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然而,“津”一旦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它的意义便远远超出了“渡口”二字。

“津”者,渡也,更是河海之会。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北依燕山,东临渤海,九河下梢,众流汇海。发源于太行、燕山的河流在此汇聚成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五大支流,于三岔河口汇为海河,东注渤海。天津正处在这把“蒲扇”的扇柄顶端。这种独特的地理禀赋,使天津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临水聚落,而是河—海—城的转换枢纽。从唐代“三会海口”的“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到金代直沽寨、元代海津镇,再到明清“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的漕运盛景,“津”始终是物资、人口、信息由腹地走向海洋、由海洋进入腹地的中转节点。

“津”者,枢也,并非被动接受辐射的终点,而是主动融通内外的枢纽。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天津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地方渡口”升格为“都城门户”。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首开海漕,江南粮船由海路抵达直沽,再经北运河转运大都,天津成为漕运贮粮重镇。明设卫筑城后,天津更兼具军事与转输双重功能。清代升州立府,盐漕商贾辐辏,天津由军事要塞成长为区域中心城市。据《天津卫志》记载:“天津为卫,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名虽为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这段史料充分说明,天津的价值不在于固守一隅,而在于它是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物资流通的“咽喉”与集散要冲。天津从来不是单纯承接外部辐射的末梢,而是以门户之势汇聚天下之货、之人、之信息,成为贯通内外的流通中枢。这正是“津”的文化内核中最具现代性的部分。

“津”者,通也,是四流交汇的文明接口。政治史家往往强调京师的中心地位,却容易忽略门户城市的功能价值。天津的“通”,不止于漕粮。政令由此下达沿海、东北、西北,商货由此聚散四方,移民由此登岸定居,新知由此转输内陆。近代开埠之后,“津”的功能从国内枢纽跃升为连通世界的接口,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开平矿务局,以及中国第一家机器铸币厂、第一家精盐制造厂、第一家电报局等数以百计的“全国第一”在此诞生;严复译《天演论》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呐喊由此传遍天下;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直隶工艺总局,使天津成为近代教育与思想启蒙的重镇。“津”的本质,是一种通道意识,不在于占有,而在于连通;不在于封闭,而在于转输。

“津”者,海也,是从河埠走向世界出口的开放基因。天津虽因河而生,却因海而大。海河五大支流汇于三岔河口,自大沽口入海,天然地沟通内陆与远洋。元代海运漕粮已开其端,明清长芦盐业将“芦盐”转运全国,近代开埠通商更把天津推向世界的舞台。天津是大运河北端唯一一座依河傍海的城市,自大沽口出海,可通达南北沿海各省,远及太平洋与印度洋。这种面向海洋的地缘禀赋,使天津在近代率先“开眼看世界”,成为西方器物、制度、思想进入中国的“窗口与跳板”。开放不是近代才有的附加属性,而是“津”字的深层编码——津门极望气蒙蒙,泛地浮天海势东。天津自古就带有一种面向大海、拥抱世界的开放性情。

“津”者,容也,是以枢纽为场、以实用为度的包容智慧。“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五方之民杂处于此。闽广吴楚之俗随漕运、盐业、商贸、军屯汇聚津门,会馆林立,方言交错,逐步融合为独特的市井文化。清代水西庄为津门雅集胜地,南北文人往来酬和,宴集不断,袁枚“名流宴咏,殆无虚日”的感慨虽非专为水西庄而发,却恰可概括江淮文脉与燕赵风骨在此交融的文坛气象。这种包容不是无差别的混同,而是以实用为度的整合——凡是有利于流通、有利于生存的,天津都不排拒。务实、豁达、幽默的城市品格,皆源于此。

综而言之,“津”之要可概括为:枢纽功能、通道意识、开放胸怀、包容智慧、向海志向。一言以蔽之,“津”是天下气象。换言之,天津的“津”并非自然地理的偶然产物,而是国家制度长期经营的结果;正因为国家需要一座城市来“通天下”,天津才被赋予了如此恢廓的开放格局。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天津的开放从来不是被动接受的“被开放”,而是主动承担的“去流通”。这是天津作为门户城市最根本的主体性所在。

“卫”
拱卫京畿的门户担当与家国情怀

如果说“津”赋予了天津向外敞开的广度,那么“卫”则赋予了它向内持守的深度。单有“津”,城市易散为商埠;单有“卫”,城市易僵为军镇。“津”以“卫”而有序,“卫”以“津”而有生机。

“卫”者,制也,是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城市起源。“卫”在明代属于军事建制。天津设卫的直接动因来自政治与军事层面,《明太宗实录》明确记载:“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船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这意味着,天津是先有“市”、后有“城”,但真正将“津”与“卫”一同予以法定化的,是国家意志。天津不是自然生长的普通城市,而是带有明确国家战略的“制度性城市”。这一点,是解读天津全部文化特质的总钥匙。天津“先市后城、市在城外”,港区与运河沿岸“百货交集”“商贾辐辏”,万灶沿河而居,卫城只能修筑在市廛之侧,无法将繁荣的港区圈入城内。这使得天津在中国城市史上保持了少见的开放型“无城垣城市”属性——卫城并未限制津口的活力,津口的繁荣也没有消解卫制的秩序。二者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共生关系。

“卫”者,屏也,是京畿门户与海陆防线。“卫”(衛),古字形像四足环绕着城邑,本义为守卫。“天津为卫,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道出它的地理门户定位;蓟州、黄崖关、三河、武清、天津卫一线,则构成明代北防与海防相连的战略纵深。天津“东环大海,西眺瀛沧,枕漳卫之长流,倚卢白之重阻”,既是“盛京之唇齿”,又是“畿南之屏藩”。明代倭寇侵扰,天津卫组织水师巡逻戒备;清代康乾之后,在大沽口修筑炮台,被誉为“津门之屏”,见证了近代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血泪与荣光。天津之“卫”,不只是守一座城,而是守都城、漕路、海门、国门四重对象。门户者,国之扃钥也。门户一旦失守,腹地便会洞开,这是百年国耻留给天津的沉痛历史镜鉴,也是“卫”刻入城市深处的文化记忆。

“卫”者,忠也,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城市的使命。“天”字不是虚称。据《天津卫志》记载:“文皇渡此,赐名曰天津。”一个“天”字,把中央政权、国家根本、大一统秩序嵌入了城市之名。天津卫的精神底色,是不敢忘京畿、不可失门户。这种忠诚,在近代历史中发生了深刻转化,从保卫一家之王朝,升华为保卫民族、保卫人民、保卫文明。大沽口保卫战、聂士成血战八里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卫”在军事层面的悲壮实践;觉悟社的成立、五四运动的浪潮、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周恩来与邓颖超的革命求索,则是“卫”在思想层面的现代转向。众所周知,天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党的早期组织在此孕育,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革命运动指挥中心”的重要地位。红色的火种,正是“卫”的文化基因在20世纪升华出的最高形态。

“卫”者,韧也,是护城河般的城市韧性。“卫”在字形上从“阝”,在文化内涵上则体现为守持、不乱、不散的韧性品格。天津历经漕运衰落、开埠动荡、战乱频仍、工业转型,却始终保持着一种“顶得住”的城市定力。这种韧性在市井中表现为邻里互保、礼俗自组织,在转型中表现为产业的迭代更新,在危机中表现为全民的团结御侮。危而不乱,变而不散,外压之下能自组织,这正是“卫”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力量。

综合而言,“卫”之内核可以概括为:门户担当、忠诚守正、尚武任事、护国护民、坚韧守序。一言以蔽之,“卫”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在天津落实为一套清晰的责任伦理,对上为拱卫中央的屏藩,对下为守土安民的保障,对内守序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对外则为御侮于外敌。四重责任层层贯通,使“卫”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职能,升华为以门户自任、以天下为心的城市人格。这也是天津在近代虽屡遭创伤却始终保有向新之志的精神根源。

在历史之维中
认知“津卫”互构的城市文化

“津”与“卫”不是简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对相互生成的原生文化范畴。“津”是灵魂,决定广度与活力;“卫”是骨架,决定深度与定力。二者共同塑造天津城市文化特质,要真正理解它,必须将其放回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

天津城市文化的源头,深植于山河海交汇的生存智慧之中。旧志所谓“滨海弃壤,无古可考”,已经被现代考古成果推翻。蓟州旧石器遗址群、宝坻牛道口遗址等,以及张贵庄、巨葛庄战国墓,说明这片土地早在万年以前就已有人类活动。九河下梢、濒临渤海,既带来航运与渔盐之利,也带来洪灾与海侵之患。先民在与水患、海侵的长期共处中形成的“与水共生、向海图存”的生存智慧,正是“津”最早的地质学前提,也是“卫”之韧性最早的精神源头。

天津由渡口升格为门户,始于漕运体系与京师的联动。曹操开凿平虏渠、泉州渠,沟通海河水系,是天津水系成型的重要开端;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天津渐成南北运河交汇地带;金设直沽寨,天津从地方渡口升格为漕运节点;元代定都大都,推行海漕,“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直沽成长为漕运、海运枢纽。其历史逻辑在于,北京成为京师,天津才从地方性军镇跃升为“都城门户”,“津”的流通功能也是由京师的政治功能所激活。永乐二年设卫筑城,更将“津”与“卫”一同法定化,这是中国城市史上极为罕见的国家主导型建城范例,用国家制度把交通枢纽与军事守备融为一体。此后城市虽自然成长,却始终带着国家意志的烙印。天津城“东西长、南北短”的扁方形格局、鼓楼居中的礼序结构、城墙外繁华的港区,都是“津卫”共生在城市空间上的呈现。

明清以降,“津卫”互构在制度与日常生活中日益深化。雍正三年(1725)天津由卫改州,雍正九年升州立府,卫所的军事色彩渐次转化为行政、盐漕与商业秩序。长芦盐业兴盛,盐商“以商养文、以文弘道”,开创了商文共荣的津门传统;水西庄、梅花诗社、《沽上题襟集》,是江淮文脉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晶,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各类戏曲曲艺在市井中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变迁,是“卫”内化为礼法秩序与文教传统,“津”外化为商业网络与市民社会,二者由制度层面下沉为百姓日常生活的肌理。

近代以降,“津卫”的内在逻辑被世界格局放大。随着开埠通商,天津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却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策源地之一。洋务新政、北洋实业、新式教育、报刊出版、话剧等艺术陆续传入,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使天津在半个多世纪内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与港口贸易城市。据统计,天津在近代创造了大量“全国第一”,正如时人评述,“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天津由此成为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制度与器物输出地”。这一时期的“津卫”逻辑发生了双重转化,“津”从国内漕运枢纽转为国际航运与信息枢纽,表现为开放包容、敢领风气之先;“卫”从守护封建王朝转为实业救国、军事自强、思想启蒙等精神载体的觉醒。仅有“津”的开放而无“卫”的担当,天津只会沦为纯粹的口岸;仅有“卫”的守护而无“津”的开放,天津将错失近代化的历史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北方工业重镇,“卫”体现为服务全国工业布局、拱卫京畿的经济担当。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港、滨海新区、自贸试验区等开发开放战略使“津”重新焕发枢纽活力。新时代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赋予天津新的门户定位,天津立足协同大局,以枢纽支撑协同、以开放服务全局。天津港作为京津冀“海上门户”、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海陆交汇点,正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连续提升。这既是“津”的现代表达,也是“卫”在新时代的功能转化。

综观六百余年的文化演进史,天津的魅力正在于“津”的开放与“卫”的坚守相互激荡,凝练为一重重富有张力的城市命题。

开放与守正:小洋楼与四合院仅一河之隔,万国建筑与老城厢咫尺相望,开放不曾消解根本,守正也不曾封闭门户;流通与安定:长芦盐业的国家专营、漕运的严格规制、卫所的屯守制度,为商道提供了稳定框架,“卫”之秩序、“津”之流通,相得益彰;五方杂处与京畿责任:天津方言、曲艺、饮食熔铸南北风情,而“畿辅门户”的定位又赋予其超越普通商埠的国家使命,市井活力与家国责任从来不是对立关系;天下气象与家国情怀:“津”如同翅膀,让它飞得更高、拥抱世界,“卫”好比根脉,让它站得更稳、心系家国。一部天津城市文化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部“津”的开放与“卫”的坚守相互激荡的历史。所谓“河海津韵”,天津城市文化最深层的内核,正在于“津卫”互构。

以“津卫”内核
塑造新时代天津城市文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天津应当用好“津卫”互构这一文化内核,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战略能力。

重振“津”的雄风,建设世界一流的开放枢纽。天津港已跻身全球航运中心前列,但这还不够。“津”的当代使命,是从“物流枢纽”升级为“文明互鉴枢纽”。以港产城融合为引擎,以适港产业为支撑,把物流通道升级为发展通道、把通道经济升级为港口经济;同时发挥天津在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节点作用,打造中外文明对话的“渤海桥头堡”,让“津”的开放包容成为吸引全球人才与资本的软实力。天津既要向海图强,更要以“津”通天下。

筑牢“卫”的担当,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总体国家安全。新时代的“卫”,已从守城御敌转化为守生态、守安全、守命脉。天津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门户”定位,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运输通道、港口保供、生态保护、网络安全等领域,当好区域的“护城河”与“压舱石”。天津不必成为“他者”,而应当好“最可靠的门户”,门户不是边缘,门户是关口,代表沉甸甸的责任。

活化“津卫”文化空间,构建城市精神地理。建议以三岔河口为核心,打造“津卫”文化廊道。三岔河口作为“天子津渡·城市原点”的标志区;海河沿线串联老城厢、五大道、意风区,形成“津卫”时空走廊;大沽口炮台、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聂士成纪念地,串连成体现“卫”之精神的近代历史教育链条;天津港、滨海新区构成“津”面向深蓝的当代文化地标,让市民与游客在空间中读懂“津卫”互构的内涵。

涵养“津卫”新风,培育新津派市民精神。城市的灵魂在于人,建议在国民教育、公共文化服务中系统植入“津卫”文化内涵。把“天下气象、家国情怀”写入城市精神的官方阐释;把大沽口炮台、觉悟社、天津港等历史素材纳入大中小学思政课;鼓励文学创作、影视作品、舞台艺术以“津卫”为主题开展创作,引导广大市民形成共识:开放不是忘本,守正不是守旧;通达天下与拱卫家国,本为一体。

健全“四个以文”的实践体系。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把“津卫”文化的特质转化为可落地的政策举措。以河海文化支撑生态文明与休闲旅游,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工商文化赋能实体经济,以建筑、文博文化提升城市品质,以演艺、民俗与休闲文化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推动文化从“概念”转变为“生活”,从“遗产”转化为“资产”。

一座城市的魅力,往往深植于其独特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基因之中。天津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曾是王朝古都,而在于它在六百余年间始终扮演着“渡口”与“门户”的角色。它把来自天下的人与物渡向远方,也把来自海上的新风引入内陆;它守护着京畿的安宁,也敞开着通向世界的门窗。

“津”是它的翅膀,让它飞得更高,拥抱世界,这是天下气象;“卫”是它的根脉,让它站得更稳,心系家国,这是家国情怀。二者互构共生,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天津——既不封闭,也不漂浮;既有面向世界的开放胸襟,又有守土有责的深厚定力。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天津尤需唤醒这种深层的文化自觉。以“津”的浩荡之气通联陆海、拥抱世界,以“卫”的磐石之志拱卫京畿、守正创新,“津卫”相济,必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壮丽史诗。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社科院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